

《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趙樹岡，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4年，456頁。

張珣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世界各地學者大批進入中國進行先前被禁止的調查與研究工作，中共也「告別革命」：宣告脫離階級鬥爭和群眾動員路線，有限度地開放國家與地方各種檔案並重新詮釋建國以來經歷的動亂與悲劇。中國大陸境內的民國史因而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國不可逃避的一個階段，近年甚而有興盛之感，佳作也陸續湧現。趙樹岡的《星火與香火：大眾文化與地方歷史視野下的中共國家形構》便是其中少數以中文書寫的佳作之一。書名透露出相對於歷史學者的宏觀大歷史——硬歷史，以政治經濟來解釋的中國共產革命史，本書是微觀小歷史——軟歷史，是從大眾文化與地方視野的角度來詮釋中共建黨、建國以來的歷史過程。

本書兼採人類學以一個社區為田野調查焦點，以及歷史學從大批地方檔案，黨部報告書、縣志、村志、校史、報紙、族譜、山歌、回憶錄及民居照片等等資料來爬梳地方史兩種方法的結合。細膩地描述閩西山區上杭縣東北的古田鎮自中共1921年建黨、1949年建國、1951年土地改革、1953-54年統購統銷、1958-59年大食堂、1960年大躍進、1967-1977年文化大革命，1963年土改完成，1978年改革開放及2000年紅色旅遊等，幾個重要階段與政治運動當中，古田鎮民如何詮釋國共兩黨的戰爭與革命？如何經驗國家權力的步步烙印？這些歷史事件在閩西地方與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帶來哪些衝擊？作者在新竹清華大學的人類學理論訓練，加上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多年的博士後研究員經歷，對於中共建國史的研究，烹煮出這本兼具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色香味俱全的鍋品，為歷史人類學做出絕佳的示範。

全書分成八章。第一章「緒論」，破題並解釋書中幾個重要概念的理論背景與學術脈絡，也帶出書中重要人物傅柏翠在古田鎮試行的「新村」社會主義理想；第二章「汀巖山坳小鎮」，鋪陳閩西汀州、龍巖、上杭等客家

地區，廖氏、賴氏、張氏山街宗族與地域組織，墟場，民間信仰等生活面向；第三章「紅旗乍到」，1929年毛澤東與朱德等人帶領的紅軍進入古田，發動農民暴動，成立古田革命委員會，被鎮民稱為「第一次解放」，古田也成為光榮的「蘇區」。古田地方菁英傅柏翠政治立場搖擺，既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被視為30-40年代擁兵自重雄霸一方的軍閥。傅柏翠不採取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方式控制社會，而是以「宗派主義」利用幾個宗族勢力不均衡，達到土地改革與控制社會的目的。並推行社會改革，諸如禁止山區迷信的金蠶巫術、禁賭、結婚喪葬禁止宴客、不許大規模造墓、提倡婚姻自由、禁止納妾、買賣婚姻及童養媳等。古田被視為「沒有地主」的「土地財富相對平均」模範區。1993年去世的傅柏翠終於還是被中共接納，並稱其當初為「白皮紅心」表面不屬於紅軍其實暗助中共。

第四章「新中國」，1949年古田地區宣告支持中共政權，鎮民稱為「第二次解放」。古田地區之前二十年在傅柏翠佔領時期以和平手段不經階級鬥爭達到的人均分配土地，亦即所謂的土地改革，卻被新中國視為錯誤，必須糾正，必須全面劃分階級，並於1956年進行土改補課運動，進行54次鬥爭大會，硬是強迫劃出300位的地主、富農等剝削階級以及重新「發現」180名反革命份子。古田以往引以為傲的「新村」、「蘇維埃土地保留區」歷史被徹底掩蓋，取而代之的是「落後小鎮」、「階級劃分不徹底」的落後鄉，一如狂風驟雨中的歷史布幕，人物與情節依舊，布幕上的影像卻隨著政治風向搖擺扭曲。隨著國家推動的各種政策，由國家代理人在地方民眾的身上擠壓操作，「階級」或是「真實」雖非憑空捏造，卻是在特定時空與國家需要之下被生產出來。

第五章「鍛造聖地」，原是廖氏宗祠的萬原祠因為1929年毛澤東在此召開的古田會議成為革命聖地，1954年維修，成為官方正式的古田會議舊址。1961年成為全國重點保護單位，1964年首度紀念活動，藉著拼貼、再現與塑造記憶，開始大量將毛主席與會議舊址神聖化。1972年增建，國家總書記與高級官員造訪不斷。經過一番空間意義的轉換，廖氏宗族的萬原祠成為紅色旅遊的聖地。第六章「革命朝聖」，文革猶如是一場革命朝聖之旅，古田會

議舊址居福建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首，卻有民眾視之為帶福還家的靈驗聖地，而中央或是官方卻斥之為將革命精神庸俗化，二者之矛盾與差異顯現出中央與地方對於同一場景之不同詮釋。第七章「映照宗族的星火」，2005年廖氏藉由有官方權威加持的萬原祠終於順利連結了閩贛粵三省廖氏宗親修族譜修祖墳。顯示民間以「隱藏文本」來將官方的革命聖地置換為宗族祖祠。第八章「結語」，作者歸納「檔案」作為一種還原歷史的材料必須考慮背後權力之運作，以及詮釋者之角度，更是永不間斷的國家形構過程裏的一種文類。

全書以「星火」與「香火」兩個意象交織串聯來書寫，「星火」指的是1929年12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人，進入古田最大宗族廖氏祠堂萬原祠開會，寒冬裡，就地燒起一堆火取暖所留下的灰黑印記，以及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之後，所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拍板訂定了中共政治軍事的指導理論，一虛一實地象徵中共革命初期的艱辛與野心。「香火」指的是古田三大宗族，廖氏，賴氏，張氏的祠堂，以及中國傳統視國家為天下，視領袖為天子，家族—宗族—國族—脈相承的「炎黃子孫」香火觀念。雖然中共基本教義派黨員斥之為將革命傳統「庸俗化」，使得毛澤東的革命起源地被民間信仰迷信的聖地聖跡傳奇所污染，但是在古田民眾心中毛澤東已經升格為傳統的民族英雄，具有神明才有的保佑人民的靈力。毛澤東所到之處所在之處都成為民眾瞻仰甚至偷偷燒香之處。作者認為這何嘗不是證明了中共建國以來成功地將「新中國」與「新文化」根植入民眾心中，也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了。

作者並未提出「Anthropology of State」一詞，但是其實本書很多精彩的討論是圍繞在以人類學視角來詮釋國家以及國家隱微而又滲透日常生活的權力作用，而讓本書呈現出異於歷史學者著作之特點所在。能夠讓本書吸引讀者的論述很大部分來自作者對於近年西方「歷史人類學」與筆者所謂的「國家人類學」著作之解讀與運用。本書的「國家」不討論政治制度，政治組織，或是戰爭，軍事占領，而是國家透過地景，空間遺址，建築物，紀念碑，博物館，巨型雕像，透過有形宣傳（歌謠，戲劇，戲曲，樣板戲，廣

播)與無形宣傳(不斷地訪問,舉辦座談會,要求民眾回憶,甚至增添原本不存在的細節,誘導式的記憶),透過強迫記憶與書寫編寫,來塑造集體記憶,進而將巨大無比的國家化整為零地一點一滴地滲透入人民腦袋與身體當中,成為無法言說的一部份。

本書透過傅柯(Michel Foucault)「隱微的、日常生活的權力」,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James Scott「弱者的武器」與「隱藏文本」,David Faure「宗族是國家秩序地方化的過程」和蕭鳳霞的「中共國家代理人」等等概念,在行文敘事中,同時做了相當漂亮的理論概念的解說與運用。

當然,若沒有作者前往蜿蜒的山區古田進行家戶訪談,或是痾僂於福建檔案館辛苦地閱讀、拼貼、兜串零落的資料,細膩地交織逝去的人事物,耐心地鋪陳瑣碎的資料,甚至以自己的想像力來勾勒歷史場景,只有人類學理論是不足以撰寫出將近450頁的書。讀者也可以讀出本書作者相當用心地與歷史學者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新村夢碎〉,以及沈松僑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等著作進行深度對話。

本書呈現的歷史不是只有官方客觀的一套事實的紀錄,而是同時並存有屬於地方主觀,可以被創造、選擇、詮釋的論述。書中使用很多比喻,象徵,比擬,意象,想像,回憶,記憶等等屬於社區與個人層次或是微觀層次的詞彙的說明,營造出一種流動的歷史觀。雖說本書完美地結合了歷史學材料與人類學理論,但是畢竟是兩個迥異學科,各有其問題意識,很難天衣無縫地結合。本書在「星火」與「香火」兩個意象交織的主軸下,異於歷史學者的處理,傅柏翠的角色在本書反而成為配角,「新村」理想成為背景。在歷史學界定位曖昧的傅柏翠,反而成為人類學理論發想的來源。

其次,固然本書反省是否有一個亙古常存的歷史?是否有一個定於一尊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版本?而作者傾向於認為歷史的詮釋與經驗不但是人人殊異,且是各個群體殊異。然而筆者認為,一旦將歷史詮釋權交給當事人或地方角度,一切變得相當不定,一切詮釋可能只是權力的運作,而這是我們都可以理解的,卻敵不過內心的不安。掩卷之後,本書給讀者留下的一個疑問

是，究竟有沒有歷史？若是下一個滔天巨浪過來的時候，我們大可以放心或是擔憂呢？歷史原是以古鑑今，如今恐怕無法在小人物的眼光中獲得答案。

本書適合文化人類學、歷史學、中國研究等學科的師生，與關心中國大陸的社會人士閱讀。